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年)

关于对外通商口岸的商业、工业等,以及有关缔约口岸所在省的情况和发展 第一卷:北方和长江口岸奉海关总监之命公布

上 海

苏应炤 译

1. 贸易和航运业

刚过去的十年里,北海的贸易区继续受到其它口岸的蚕食。1907(光绪33年)年南宁开放通商,又一个口岸加入了起自广州湾终止于海防一线的贸易中心,这就从各个方面给我们的贸易带来了抗争。更有甚者,在还剩给我们的分散的小块贸易区内,居民中的反复多起骚乱事件,更进一步对我们口岸的事务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间,我们的贸易从总体来看虽然衰落了,然而好些项目却是这总衰落中的例外。在进口项目中,Lenos、厚绒布、意大利布、花毛布、帆布、铁枝、铁钉、镀层铁线、铁板、钢板、香烟和槟榔;在出口项目中,木柴、花生、花生麸、花生油,所有这些都增长了。就进口方面而言,其增长的原因似乎是这些物品的用途扩大了。Lenos 很大部分用于制造蚊帐,意大利布用在制鞋方面有很大的增加,帆布也是制鞋业大量需求的,也用于制帆布椅。铁则越来越多地用来制造家庭用具和田间使用的工具。中国人已非常普遍地抽烟了。槟榔来自海南,本地消费很少,绝大多数输入广西,在那里用于所有社会祭典中。上述出口项目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香港人口的增长,可以假定广州亦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各种家庭用品需求量的增大了。中国人广泛使用花生油来烹调,而木柴则大量地用于烹制食物,这可能就是这两项出口增大的原因。

在航运业方面,进入本港的船只数在 1903 年的 164 艘和 1910 年的 98 艘这个幅度之间,吨位数则在 1907 年的 121,649 吨和 1905 年的 73,500 吨幅度之间。然而这些数字上的差别与贸易上的兴衰关系不大,例如 1908 年的航运业是衰落

了,然而进出口量却比前一年高出许多。进入本港船只数的增减很大程度取决于海防和香港之间的贸易状况,如果贸易出现萧条,轮船就在香港装上北海货船运抵那里的货物,同时还将知会本港把等待装运的出口物品收起。

2. 收入

税收自然随着商业的衰落而走下坡路,在这十年中的头一年征得的税款稍微超过138,000港元,而在最后一年总计才略多于99,000港元。税收的下降不是稳定的,有些年份的情况会比其前一年有所改善。最低的税收额是在1910年,是年的收入总计才97,340港元。这一年由于长期持续的干旱和疫病的破坏,毕竟对商业十分不利。这十年的最后一年显得比前一年有了很大的恢复,其时政治骚乱尚未发生,只是到了岁末才发生。出口和进口两方面的税务分别承担了这十年间的衰减。鸦片的税收波动很大,不过这种贸易不同于一般商品的贸易。吨位税总的是增长了,自然这意味着有更多或更大的轮船莅临本港,可是,如所谈及,吨位数与本港商业的兴衰关系不大。北海的运输业总数甚小,这方面的税收从来不曾对我们总的收入的增减有多大影响。

3. 鸦片

这十年间北海在外国鸦片的贸易方面受到从广州湾进口的极大妨碍,那里对进口鸦片的征税跟在缔约口岸必须缴纳的税额相比较,合计起来总是要少得多。这十年的头一年的进口量是132担(每百斤为1担),1903年是123担,1904年是133担。然而在1905年,由于法国口岸推行了新的药物贸易法规,这里的进口量开始上升而达到176担。其后的三年进口量稳定地上升直至1908年的279担。1908年中、英之间的新协定开始生效,鸦片货源渐缺、价格上涨,进口量迅速下跌,到了这十年的最后一年,进口量只达77担。

在本国鸦片方面,这十年的头四年里大都是向本地的税务局缴纳税额,数目为 1902 年 38 担,1903 年 70 担,1904 年 49 担,1905 年 41 担。其后 1906 年据税务局的报告不足 1 担,不过在这一年开始从轮船输入本国鸦片,有 8 担是这样运抵本港的。在其后的几年里,1907 年由轮船运来了 14 担,1908 年 95 担,1909

年 14 担。自此以后再没有本国鸦片通过税务局或海关了。但前面的数字并不能正确地指明鸦片消费的增减,当时贸易不受限制,本地区消费的大量本国鸦片是由为夫通过陆路从云南运来的,并在本地交换那个省份所需要的外国货物。大量的麻醉药物逃避了交税,也没有被关税部门记录下来,我们的数字只能看作是部分地指明其消费情况。经常都有大量的走私在进行,走私越多,我们的收益就越少,反过来也一样。

云南或四川的鸦片从陆路来到北海有好几条路线,最直接的是从那里取道经南宁一直下来,另一条路线是从南宁到钦州再乘帆船到达本港。由于考虑到土匪盗贼的原因使第一条路线不能走的时候,通常就取道第二条路线,这样鸦片就从钦州经海上到达北海,这就不那么容易走私进入本港。1903年的增长部分就是由于很大程度地利用了这条路线。第三条路线是经由东京(Tonkin),不过我只知道有一次鸦片经由这条路来——那是在1906年,货主没有按照我们处理外国药物那样对外国鸦片的征税比例交纳税额,该税额自然扣除了进入东京之前已经交纳了的那部分。1907、1908、1909 这几年输入的本国鸦片全是来自四川,除了1908年那10 担云南鸦片之外,那是经汕头来的。那几年北海经海口和汕头之间经常有交通来往,有人说取这条路线输入四川鸦片是有利的,因为那些来自英帝国禁令下的许多吸烟者需要一种略带香味的物质,以作为培养吸烟习惯的第一步。

4. 货币和金融

北海的货币由大银圆,5分、1毫和2毫的碎银币,铜先和铜钱组成,也有相当数量的广州纸币在流通。在本地商业交易中所谓一圆就是5个2毫碎银,因此2毫碎银可以看作是本地硬币的标准。向海关银库和中国邮局付钱要用大银圆,但它们的供应有限,也不稳定;其价值按2毫碎银来衡量也时时在改变。此外银币与铜钱之间的交换也经常在变化。在这十年的开始时1枚大银只值840铜钱,到了1908年已经上涨到1090铜钱。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供应有时大于需求,有时又小于需求。政府和海湾银行(the Haikwan Bank)之间对各种硬币的供应没有协调,以维持需求。不过在北海和省会之间交通如此不便的情况

下,我怀疑这种协调会有什么效果。至于纸币,人们使用它是因为便于携带。钞票代替碎银币流通,但它们并不总是像面额那样值钱,有时在交易中低于厚面金额百分之五。对进口物资大量用出口银币来偿付,有时可发现颇多的银币在装船运输。至于用什么代替这种金属的供应取决于需求的不同。从我们统计的财物报表可以看到银的输出量要比输入量大得多,由于这里又不是产银的地区,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不断地补充的银来自何处。事实上我们的统计只是表明了通过关税的东西,大量的硬币是由旅客带进来的,他们把从国外挣得的钱带回来,而这些我们是无法记录下来的。还有大量的硬币是为了支付本地区的军需而用炮舰从广州运来的。当然这些钱是在各个地方进入流通领域的,在某个时候便会流入北海。反过来,就进口方面而言,钱财送到这里是为了支付某些出口物资的,但这方面的数量从来就不大。虽然北海没有国外汇兑银行,这里的商店常常参照香港的计算筹码予以解决,避免了硬币的迁移。如果不考虑贸易上的平衡,我们把每一年的进出口的钱财加上进出口商品的价值,很难找到这两方面的计算结果有什么相同之处,然而如果把每方整个十年的数目合计起来,我们就发现一方恰巧接近于平衡另一方。

5. 人口

没有得到广东省这部分地区的有关人口的可靠统计数字。

6. 水路、港湾、停泊点

在北海半岛的末端隆起的高地标志着港湾的进口, 晴天时在海上距 20 英里处就可以看到。因此在船只到达泊位前很久就可以在甲板上用望远镜找到港口的确切位置,这对水手是很大的便利。虽然沙洲从人港航道延伸到停泊点, 航道仍很容易找到, 而且由于这条水路上没有岩石, 访问本港的船只极少会遇到不幸。同时不管刮什么风, 抛锚的船只都是安全的。因为海港的四面都受到掩护——在北面和西面有沙洲, 南面和东面则有陆地。有一个不便是轮船必须停泊在离岸相当远的地点, 不过除非是刮风的天气, 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用驳船装卸货物。因此无论何时都几乎没有轮船受到滞留, 运费便能保持最低。港湾的水不很深, 在

最低潮时,入口处浮标之间的水深只有20呎。不过这对于定期到本港经商的轮船已是足够的深度,可以在任何潮夕情况下进入或离开本港。

7. 灯塔和领航设施

P 政府没有在北海区域建立灯塔,由官方维持的人造领航设施只有三处浮标,两处标示由入口到港湾的航道,一处给船只指示 12 英尺以上水深的东面界限。在白天这三处浮标足以指示船只进出港口,可是每当轮船在夜幕下驶离港口时,经常是在靠着右舷入口浮标处配备一艘舢板,从那上面射出电筒光来。舢板是聘请的,由轮船付钱,每次 2 美元。光线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耗费又甚微,因此也无须费心去寻找更好的办法了。

8. 邮政和电报

在这十年间,中国政府邮政局已经在本地区增设了属下机构,因此在北海邮政总局属下官方的邮政所已达到 48 所,加上总局总数为 49 所。1911 年这 49 所邮政所之间共处理了 50 万件以上这样大量的邮件。各邮政所之间的距离总计超过 1100 英里,走在这全部邮路上的邮差全是步行。所进行的业务大量受到动荡的政治形势的干扰,这是这十年的终结的特征;不过当事情逐渐平息,一个新时代就会开始,那时将进行普遍的改革,业务将重新活跃起来,并随之兴旺发达,邮政将不断地从此获得利益。

我们的电报通讯包括以下几条线路:一条线路到东兴,临近法国属地;另一条线路到西江,在那里与广西通广州的线路相联接;还有一条线路通高州,在那里又联接上通广州的线路,还接上向南通往海南的线路。大多数时候通讯线路工作正常,可是台风、洪水和白蚁会破坏电线杆和电线,由于这些原因,不时发生通讯中断的现象。

9. 行政机关、地方议会

直到 1889 年钦州县都是在廉州的管辖之下,就在那一年它成为独立的县份,该巡回区的名称便从高廉改为高廉钦。钦州县境沿着法国属地伸展,那里经常性

的侵犯事件使得担负该县职务的长官应该具有较高的级别和独立于县官。因此它直接在高州道台管辖下构成一个独立的管区。从 1889 年到 1906 年下四府(即高州、雷州和琼州或海南)组成两个巡回区,分别命名为高廉钦和雷琼巡回区。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不甚令人满意,于是在 1906 年重新组成了府。廉州和钦州组成一个巡回区,道台驻在钦州;高州、雷州和阳江组成另一个巡回区,道台则驻在高州。至于海南岛则划分为一个府(琼州府)和一个县(崖州县),由驻在岛上的一个道台管辖。这样一来在靠近法国属地的每处地方(东兴和广州湾)都设置有一个道台,麻烦就容易解决得多了。当然,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旧官府没有了,国家政府掌握在军队指挥官的手中,他们努力维持秩序。无疑地全面的建设迟早将会实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地方议会,这是在1908年作出决议案要建立的。1909年5月,每个府、县、区都选出了自己的会员。同年11月各代表都到了省会,议会开始处理事务。它首先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采取措施禁止公开赌博,这已经进行好些年了。议会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了许多事情,不过这里没有得到会议进行的详细情形,因为现时它还不是那么公开的;但是一俟新政府恢复了秩序,它无疑将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由于官员和人民都迫切要求进步和改革,他们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议会将易于通过对社会有利的任何议案。1909年公布了自治会章程,任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他为公益事业捐献达2美元,或每年交付地租税金总计达2美元,或具有价值1000港元的财产,那就是符合会员的条件。地方议会的选举用投票方式。每个府、县或城市,每个集镇和乡村都有其自治会。北海自治会的成员在1911年(宣统3年)中选出,可是还几乎来不及做什么事情革命就来了。就像地方议会那样,其时它处于隐蔽状态,可是一俟新时代真正开始,肯定会证明它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有用的分部。

10. 司法、警察、监狱

在1911年1月新法院开始工作。司法是由按新程序专门训练的审判员,以最先进国家的制度为榜样制订出来的新法制来管理的。7月末,为开展司法业务

而建设的大厦落成,虽然它不是各个方面都那么完备,审判官也到达了广州。法庭由 个审判长和五个助审员组成,高等法院设地方律师一人和助理律师二人,违警罪裁判所设裁判官二人和检事二人。条例规定在新警察局管辖下的各区内提起的控诉,不管什么情形均由新法庭审理,在别处提起的控诉则由地方裁判官料理。在某些方面仿效了日本的制度,不设陪审委员团。等候审判的囚犯监禁在法院附属的监狱内。自那时起的四个月里法庭都开审,直至革命发生。除星期日外审判官都用白天进行听证和裁决。审判机关还缺乏经验,然而已能使工作满意地进行。审判官都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并精于自己的业务。而警察对立案和整理证据的工作都是生疏的,案情所需凭证往往失却。当然,时间将会克服这些缺陷,当法庭在新政体下再次开庭时,他们无疑将工作得更好,并迟早要对那些寻求司法机关给予满意解决的问题实施司法解决。

警察武力建立于 1906 年,这是一项革新。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没有特别目的地巡游于街头,这对居民来说是一种新奇的景象。人们对此还不理解,这部分地区的市民的合作不会达到很大的程度,而这对于任何一个警察的工作效率都是必须的。由于革命,警察武力消失了,都转到军队去了。无疑地它还是要恢复的,当人民所受的教育和对事物的知识都普遍地进步了,管理官员将能更好地指挥他们的人民,而人民自己将逐渐地更加了解自己的义务,公众亦将重视这种武装力量的价值,并愿意随时提供任何所需要的帮助。

直到旧的行政机关终结,监狱系统都没有什么改变,除了在这十年间,为了教给囚犯有用的手艺,与地方监狱联系开办了一些工场。这些工场之一设在廉州,一处设在钦州。那里所收容的犯人的种类看来没有什么规则,包括老年的、青年的各种罪犯。两年前我参观了廉州的工场。罪犯的住房很清洁,他们表现很有秩序,正在练习各种手艺,看来他们的饮食和受到的照料都不错。在新政权下迟早肯定会举办许多这样的工场,在那里犯法的罪犯将受到教育和惩罚,这既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

11. 农业

中国部分地区的人口几乎完全依赖农业来生存。然而耕作土地的方法仍然十分原始,可以确切地说,土地只是用来生产了在更现代化耕作方式下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同时,在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的年头,农民可以在和平环境里自由从事副业生产,土地总是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还有大量的剩余供出口。

但这里土壤的产量并不完全相同,合浦县的土地是贫瘠的,钦州较好,灵山县的土壤是三者中最好的。后者的名称是山地的意思,但它具有许多宽广的和肥沃的谷地,受山溪水的良好浇灌,因而盛产稻米。该县还有河流在北海与钦州两地与海洋相交通。对于见惯了北海和廉州周围田野的贫瘠面貌的任何人,灵山的谷地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沉甸甸的稻穗,粗大的糖蔗茎杆,生长繁茂的甘薯以其大量的叶丛覆盖着大地,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里的土壤生长的农作物要比滨海地区的产量高出许多倍。灵山靠的就是这肥沃的土壤,而北海主要依赖的则是进出口贸易。

像华南地区普遍的那样,这部分地区的农产品中稻米居第一位,以灵山县和河流两岸的栽种得最好,在那些地方可利用灌溉来补充降雨量的不足。也栽种了不少的坡稻,这种稻不需要水,可是产量不如水稻那样高。查看一下我们统计报表就可以看到每年都是进口稻米,有些年的进口量还相当大。我们进口的稻米来自邻近的口岸海防港。从那里进口稻米并不意味着我们这里发生了饥荒,而是表明海防的稻米较便宜。可以说海防是北海的侧门,从该港进口稻米运输途中耗费要小,那里的米价仅比这里的进口价格略低一些。在丰收的季节,蔗糖大量生产和出口。所用的从甘蔗压榨蔗汁的方法是十分原始的,压榨设备由装在木框内的两只直立的石头滚子组成,由一头水牛或这类动物来转动。当然现代机械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其费用要远远超过农民的这些工具,即使他们有了好的机械设备,但他们的机械知识也很难使他们这些设备发挥最好的效益。

能是这里土地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产物,可是其出口衰落了。这部分地由于 其它口岸从我们这里夺去了贸易市场,也部分地由于人造靛或胺尼林蓝染料的竞 争.这些染料已大幅度地取代了靛。 猪是我们出口贸易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看作是农业的副产品。在农业丰收和农产品便宜的年头里,农民养猪耗费甚微,因此北海总是生猪出口香港的良好市场。农民大量饲养生猪并运抵本港。

12. 矿业和矿产

在本省的这部分地区现时没有开采矿藏。在北海东面约50英里的一处叫做石头埠的地方曾在1897年开采过煤矿,现时已停了下来。该处的采矿进行了6年,但煤的品质是下等的,没有卖得足够的利润来应付支出。该企业在1903年中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1906年在临近东京(Tonkin)的东兴附近开始开采锑矿,那一年有2010担这种矿产品经北海出口。然而由于不合算,到1907年便停止开采了。在钦州附近的地表发现铁,用于制锅。从廉州江的砂子里淘得少量的金,据说该金属的色泽很淡。食盐居矿产品的首位,这里要提及一下它的产量。有人告诉我,每年从邻近各县用帆船向北海输入粗盐17,000担和精盐200担。其中一些留在本地消费,但大部分是转运内地供那里消费。在本项目内提到珍珠并非全然不确切。在本地的涠洲岛、雷州半岛之间的海岸外面都发现有珍珠。我曾经见过一些颗粒很大并且光彩夺目的珍珠。然而珍珠的售价看来并不很便宜,如果驻在这里的外国商人购买一些并送到欧洲去,在那里卖出的价钱并不比购买的价钱高出许多。

13. 加工制造业

中国这部分地区的加工制造业绝大部分属于将天然产品进行初步加工的过程。从甘蔗榨出糖,从植物制成靛,从茎杆剥制黄麻纤维,从花生榨得油,从茧纺成丝,将皮革鞣制成粗制品等等。值得注意的唯一一种完整的加工产品是钦州出产的质地精良的陶器,King 先生在上一个十年报告中对此作了很好的叙述。这种陶制品实在是如此精美,官员们已经先后把一些实物作为贡品奉送给帝国宫廷。还要提及的是廉州制造的爆竹以及用进口的印度棉纱手工纺织的布,也织造了大量的麻布。本地区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加工制造业。在上一个十年报告中提及的设在高德(Kotak)的锯木厂由于无利可图和管理不善、已经关闭了。

14. 铁路和公路

本省的这一部分尚未有铁路。1906年以廉州铁路有限公司之名筹建一间公司,计划十分广泛,包括了诸如进行 4条线路的建设,全都从廉州城向外放射,通北海、灵山、博白和钦州。发起者举行了若干会议并颁布了发起书。该发起书说,资金由本地区 800,000 人口分担,每人 5 美元,共提供资金 4,000,000 美元。然而计划落空了,由于当地人民中间缺乏热心,他们对于提供所承担的款项不感兴趣;另外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他们要求把建设铁路的优先权出让给他们。对北海来说,跟内地便利的交通肯定要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加需要。本口岸给予船只提供了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的良好停泊点,而一条从这里通往富饶的内陆县份的铁路肯定会使出口增加,并随之也会增加进口,使与出口相平衡。但是在中国的较为中心部分发展起来以前,我们很难期望在中国的这边远地区会有铁路。

在最近这十年间,历任道台都已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这些地区的公路。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区,例如,灵山和西江之间的公路,其间爬山下坡就要比过去少了许多。其缺点是没有铺以碎石,每逢下雨潮湿天气,路面就被牛车和手推车所辗坏。这些车的轮子如此之薄,以致很容易陷入泥土中而造成很深的车辙。

15. 教育

本省这一部分地区的教育经常处于落后状态。本地人尚未养成温顺平和的习俗,经常性的骚乱闹事以及进行反对官厅的斗争和战斗已经使人民的心理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这对于任何一般的培养学识的要求都是不利的。没有关于本地识字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我要说,那些能够阅读和书写的人所占的百分数比起广州邻近地区来要小很多。在旧教育制度下,一般的考试自然都在府城举行,获得秀才级别的人也有许多,但从来都不如本省其他地区的较低级府城那么多。当学生从这儿附近到广州去参加省试竞争时,他们当中获得省级学位的就比较少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期望新的学制的引进会唤起多大的热情。事实是在征收维持新学校的钱时一开始便遇到困难。在新教育制度下,每个村、镇和城市都有小学,每

个府城有一所中学,此处为了更高级的教育,也要有一所师范学校。城市里的学校是官办的,其维持费用部分来自旧书院的基金,部分来自献祭钱,部分来自特别募款的捐赠。至于集镇和乡村的学校则由当地管理和维持。廉州城、钦州城和灵山城,一些集镇和一二个乡村都有了自己的学校。廉州还有中学和师范学校,此外还有一所法律学校和一所农业教导学校。有三级小学,在这些学校成功地学完全部课程的学生,由地方长官授予证书,该证书授予他们进入中学学习的权利。教授的课程如下:自我修养、中国古文、历史(中国史、日本史和西方国家史)、图画、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算术和代数、英语、自然历史、林业学、矿物学、卫生、化学、法律、政治经济、音乐和体育。小学和中学都教授同样的科目,然而前者只是教一些初步知识。中学毕业后,希望继续受教育的学生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监督下接受一次考试,通过这次考试的学生便可到省城去参加教育监督官的考试、他们给成功的学生授予证书、允许他们进入大学。

新学校是在 1901 年在廉州开始建立的。小学和中学都有了许多学生,还输送了毕业生去广州。关于法律和农业学校,它们的基金从来不足以维持办校的需要,我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培养出来了律师或是科学农艺师。自从旧政府瓦解,所有学校都关闭了,学生也分散了。不过等到新政体牢固地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期望看到学院的恢复和国家教育制度的确立,这将适合于人民的需要,并自愿地支持它。

16. 市政、卫生

像北海这样的市政府还保留有古老的传统,这就是说,纯粹地方上的事情由 地方上的长者来料理,地方官员不予干涉。

关于卫生的改进方面,在1905年设立卫生管理处,由8个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其中4人代表北海家庭成员,4人代表广州人的店主。经费是征集来的,由一名清道夫的职员来支配。但我怀疑他们的工作对于促使死亡率的减小是否会有什么效果。这里的人民还不明白污秽和疾病彼此之间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单不跟卫生管理处合作,甚至反对卫生改革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于改善

当地普遍的健康状况是必须的。

这里没有博物馆。

北海有两所中国的医院,即爱生院和太和医局。前者用当地富人捐献的钱建 1905 年,按照管理规则,每天应有一位医生诊病若干小时。开头是这样做了, 该医生是本地人,可是到后来规则成了空文,医生停止了诊病。现时该机构只是 用作停放危重病人的地方。太和医局是由在北海的广州商人建于约 20 年前。这 年的上半年发生流行病,经常都有两个医生诊病,可是下半年便只有一个了。轮 流负责全年诊病的主治医生总是来自广州, 他在那里是这项职业的有名望的人, 他的助手只是一个本地人。在春季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还有一个专门的医生进行接 种牛痘。本地还有两所外国医院,与教堂传教会相关联的北海教会医院由荷达博 士(Dr • Horder) 建于 1886 年, 附属于该医院的还有一所很大的男女麻风病人收 容所。虽然医药科学对于治愈这种可怕的疾病尚无能为力,但在收容所里已经采 取了一切措施来减轻这些不幸患者的痛苦。这些遭到家庭和朋友遗弃的患者,在 这里找到真诚的同情, 仁慈的待遇和合适的职业, 所有这一切给予他们很大的安 慰,并减轻他们生活的痛苦。总的说来,这所医院装备有进行外科手术的各种现 代化设备,包括一台 X 光机。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设备在诊治各种疾病上是很有效 的,连麻风病也不例外。法国政府医院开办于1900年,也做了很好的工作。该 医院的规模不如教会医院那么大, 但所有求医的人都受到接纳和细心的诊治。经 值班医生熟练诊治的许多疾病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使得这所医院的名声传播到 远离北海的地方。

17. 侨民和移民

直到现时为止我们的统计表明,我们的中国过往旅客大多数是前往香港或来自香港,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莅临本港的轮船都是开往那里或来自那里。其中许多人离开这里去香港只是把它作为转船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取道前往南洋——新加坡、泰国、爪哇等。在离开 Sumatra 东海岸外面的 Banka 岛上的 Muntok 锡矿做工的中国劳工经常有许多人要走这条水路,从北海去的大量移民就是取这条

路到那里去的,这十年的头四年里超过 6,000 人从这里乘上专门租用的轮船直接到那里去。但是由于苦力在那里所受到的待遇, Muntok 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间没有好名声。1905 年总督拒绝为那地方招募人员再发给执照,这部分地区由于这个原因,部分地考虑到在国内的这些人所提出的对不合规则的诉讼。从那时起到现在再也没有直接到 Muntok 去的移民,虽然间接地陆续到那里去的无疑还大有人在。该矿劳工来源的困难已造成不便,我推测矿主已受到一些损失。1906 年开始,荷兰、印度政府在每年的春季都租用一艘或更多的轮船,把那些在 Muntok 想回家的中国人,从 Muntok 直接运到北海,他们应得的工资在他们到达这里时付给。总计有将近3,000 个这部分地区的土人被用这种方式送回国。这样给人造成的印象无疑是良好的,同时对那些到 Muntok 去的移民的所有限制也先后大部分取消了。与此同时可以预言,中国人已经接纳的改革和进步的精神,将会在中国广阔范围内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它将为所有需要它的人提供服务,那就不需要再向别的地方移民了。对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铁路或其它公共工程,将吸收全部可能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随着国内提供的充分就业机会,再也不需要到国外去了。

18. 价格、工资

在生活费用上涨方面,北海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例外。食品和布匹的价格,这里和别处同样上涨了,工资也在增加,人民生活的主要必需品稻米和木柴比过去要贵了很多。从前,当本地的稻谷有时失收时,毗邻的海防港便是我们的强大支持者。但是近年来香港、广州甚至更远的北方对稻米的需求如此之大,使得那里的米价上涨,有时甚至高过北海,因此进口已经停止,在本地市场我们已经有两年多几乎没有东京(Tonkin)米了。人民群众耗用的红米在这十年的开始时为每斤30钱,到了1911年底为每斤58钱,这是很大的涨价。香港和广州对木柴经常都有大量的需求,这十年间的出口量大大地增加了,其结果是在这十年里木柴的价格翻了一番多。番薯在这些地区几乎都是用来饲养牛和猪的,但当米价昂贵时人们也吃番薯。现时番薯极大量地用作人的食物,而需求的增大又引起价格的上涨,其价格已比十年前贵了三倍。

关于工资,这十年里大约增加了一倍。从前由北海到廉州这段17英里远的旅程,每个轿夫可得25先,现在却要50先。熟练技工的工资也按比例地增长,木匠、泥水匠每天要25到30先,跟十年前的15先形成对照。前面已经记载的铜钱对银圆比价的下跌也产生了影响,劳动者不得不用更多的钱去购买进口货物,如做衣服所用的布匹,这是要付银圆的,这样一来生活费用就要增加许多。

19. 灾荒、流行病

1902 年秋季作物部分失收,由于缺雨,糖和靛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这一年大量的猪——将近 19,000 头装船外运,这是由于食品昂贵,会增加饲养这些动物的成本,这就促使农民在它们成熟之前把它们卖掉。我们的统计数字表明大量移民前往 Muntok,这是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萧条,而原产地雇工减少的需要。1903年春早,结果作物歉收,特别是稻谷,价格上涨到每担7美元。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与此成为对照的是秋收很好,当年农业的收成并不算太差。

1905年刮了一场台风, 给糖蔗造成很大的损害。1906年降了一场暴雨, 内地洪水泛滥; 当年9月也刮了一场可怕的台风, 许多地方的庄稼遭到毁灭, 商业很大程度处于瘫痪状态。1907年疫病夺去了大量的牛, 这就是皮革出口增加的原因。1908年10月刮了一场台风, 对庄稼造成一些损害, 但不像 1906年的那场台风造成的破坏那么大。1910年的降雨量是我们已经记录到的最低值, 总计才 55英寸。河流部分地干涸了, 航运已经停止了一段时间, 内地人民无法将他们的产品运到港口。然而在8月和9月却下了好大的雨, 作物得到了灌溉, 河流又充满了水, 当春天到来时, 人民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他们的损失。这十年总的看来,可以这样说, 虽然有匮乏的时候, 米价会偏高, 然而任何时候都没有饥荒, 食物的短缺绝不会延续很久, 饥饿从来没有使人民苦恼。

还要讲一下过去这十年里有关疫病的故事。在大多数年份的春季和初夏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鼠疫发生,但1910年在北海和廉州两地却猛烈地流行起来,许多人因此受害。据估计1910年的这场疾病的侵袭,单在北海就夺去了1000人以上的生命。而在鼠疫发生之前还有天花流行,这也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如前所

述,这年是太早年,正当5、6、7月,正是太阳最热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水份, 而总降雨量却小于9英寸,这就无法冲洗街道和水沟,病菌因而得以自由滋生繁 衍。

20. 陆军和海军的变化

旧式的军队组织一直存在到革命的到来。有一位镇台驻在廉州,指挥正规陆军,还有炮舰和护卫舰,后者直接接受驻龙门的帅台(Hsieh - tai)的命令。还有一支新的现代化的特别边防军驻扎在离东京湾(Tonkin)边境附近,由一个独立的指挥部指挥。革命自然改变了所有陆海军的编制,现在正处于未稳定的状态,还未有迹象可以看得出他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

21. 地方出版物

1903年3月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做"东西新闻"。该报与香港的一份地方报纸相联系,并复印它的指导性文章。编辑是德国教会的Bach 先生,该报也由德国教会的印刷厂印刷。本地上流社会给予该报刊相当的赞助,在最好的时候,订阅者多达1800人。该刊每周发行一次,每份价格为35钱或每月10先。然而这个价格对于一般的街民实在太贵了,因而零售数量有限,而募款又难于征集,该报无法支付,三年后,在1906年3月宣告停办。

詹姆士·艾奇逊(海关总监) (James Acheson) 北海海关 1911年12月31日